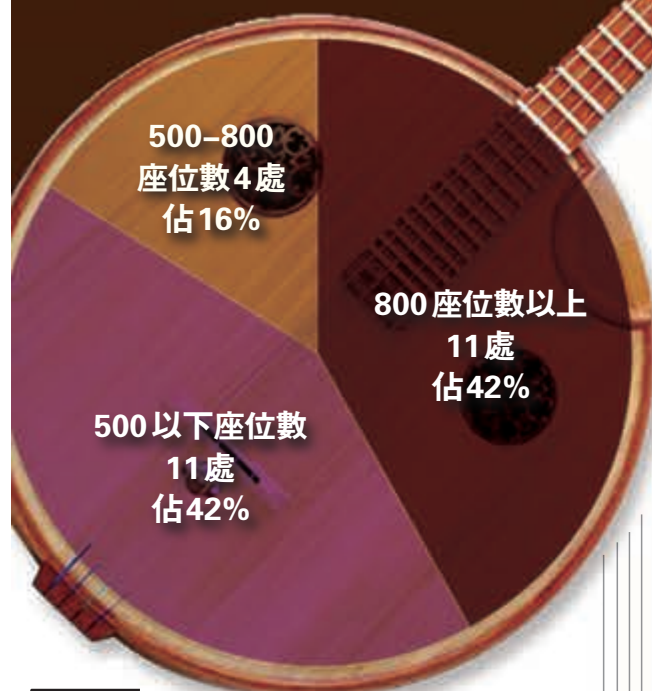


本港政府下屬演藝場地 座位數統計

資料來源：根據康文署網站所載內容統計

港九新界，康文署下轄場地共計16處，由於有的場地可提供兩處或以上表演空間，全港可供藝術團體申請的表演廳計有26處。具體座位數統計如下：

總計：26處



「交響化」自救 冷門樂師難求

據業內人士介紹，組織中樂表演團體，最為關鍵的問題，其實是人才的尋覓與組合。一個具有交響化演奏功能的中樂團體，人數應當保持在60人至80人左右，且至少應當涵蓋吹管樂器（例如嗩吶）、拉弦樂器（例如二胡）、彈撥樂器（例如琵琶）、打擊樂器（例如鑼鼓）等四個方面。不同的樂器門類，代表演奏家不同的專業背景。所以，對中樂團體而言，專業樂師的參與是藝術團體最為重要的運作條件。因為只有樂器配備完整齊全，表演團體才能夠根據作曲家在總譜上的要求，最準確地詮釋出音樂作品的聽覺感受和人文內涵。

而包括香港民族藝術團在內的民間中樂團體，其人數根本不可能達到80且更不可能涵蓋每一個樂器類別。但民間中樂團體所缺乏的，恰恰又是數量較為稀缺和緊張的冷門樂器樂師。冷門樂器樂師往往在中國內地或是海外會更多，本港則較少。所以，每引進一個或一類樂器的樂師，成本必然增加。而更令人唏噓不已的是，對於大型的職業中樂團體而言，可以依靠政府的資助特邀中國內地或海外的演奏家任職客座甚至長期聘用。但對民間中樂團體而言，這一切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香港民族藝術團為內地來港演出藝術家製作宣傳海報，而這也是一筆巨大的成本開支。

民間中樂團體 熱盼政府甘霖

有不具名的本港文化學者認為，在政府的視角看來，只有專業化、高端層級，才代表藝術的國際化，所以政府對待中樂長遠的發展，是著重大型的舞台表演，而非藝術文化的普及和推廣，因此能夠獲得政府資助和扶持的，也就是類似於香港中樂團這樣的大型、職業團體。不僅如此，官方往往傾向於從外地招募演奏人員，認為這是走向世界的象徵。由此帶來的一個長遠影響是：真正體現香港本土中樂發展的藝術意涵，其實並沒有得到有效的展示。

學者表示，民間的中樂團體，往往從一個側面寫照了香港作為華人社會，其傳統音樂發展的特色與價值。畢竟，更多的市民、普羅大眾，是帶著親情和鄉土的心境去欣賞音樂。大型舞台的絢爛，不能夠阻礙社區與市民藝術鑒賞力的提升。在香港這樣一個快節奏的商業地區，每年真正走進大型會堂欣賞大型職業中樂表演的，其實在人口中的比重並不大。民間中樂團體本身與社區、民眾生活走得更近。政府在資助大型專業藝術團體的同時，也應該明白，香港也同樣需要市民社會的鄉土音樂，故而政府應該改變態度，以主動資助代替被動申請制度，並在中型場地等各方面對他們進行幫助。

探問香港傳統藝術前路 系列之一

中樂（或稱民樂）是中國傳統樂器演奏的統稱。除了香港中樂團這個享負盛名的團體之外，更能體現本港中樂發展現狀的，則是一些活躍於民間的中樂團體。本報採訪發現，由於營運成本巨大、演奏人才短缺、缺乏合適表演場地等因素，香港民間中樂團體處在虧本經營狀態，前景堪憂，因此，中樂在香港的普及與推廣陷入舉步維艱的困境。

■採訪、攝影：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非官方藝團：缺錢缺場缺人才

民樂乏援民不樂



■受制於人才、場地、資金之限制，民間中樂團體無法擴大陣容、進一步發展。

作為本港民間中樂團體之一的香港民族藝術團成立於1984年，常任演奏人員約40人，多數以平時從事音樂教學為生。其總監、指揮嚴健民透露，他們不久前剛於屯門大會堂進行一場名為「金秋的旋律」的獨唱獨奏音樂會。對於該演出的評價，嚴健民坦言：上座率僅為一成左右。他表示，出現此種情形，並非樂團成員不努力，而是與香港當前的民間中樂團體所遭遇到的發展困境，有著巨大的關聯。

贈票催谷上座率 表面風光阮囊羞

今年上半年，嚴健民邀請一位內地歌唱家來港合作演出。表面看，彼次演出取得了較大成功，上座率高達近八成。但嚴健民說，即使是如此高人氣，藝團其實仍舊處在虧本營運狀態。

據悉，為拓展在香港的知名度，來自內地的歌唱家自己出錢，買下不少門票贈送給本港的一些專業權威人士以提升演出層次。這一做法已成為通例。作為擔任伴奏任務的民族藝術團指揮，嚴健民本人也自費買下不少門票用以贈送。但送票抑或市場化的售票，都是透過康文署的城市電腦售票網進行，每賣出一張，康文署會收取兩元左右的手續費。故送票也被計算進了官方的售票總額中，但實際售票額其實不足出票數的一成。

門票銷售雖盈利，演出成本卻未見少。與職業化的香港中樂團相比，民間中樂團募款渠道窄，難以獲得政府資助，商家也會基於成本和效益考量，不會對處境艱難的民間團體進行扶持。嚴健民無奈地表示，一場普通演出，海報製作與宣傳、場租支付需5萬多元；另一筆開支是支付給演奏員的勞務費，每人每天差不多600港幣。特邀藝術家，單人價碼可能高達數萬。此外，中樂演出往往是和中國傳統民族歌曲演唱相結合或是與民間曲藝相協作。嚴健民表示，這使得與藝術團合作的演出嘉賓，多來自中國內地或海外華人地區。藝人往返路途遙遠，差旅交通費開支頗為巨大。正是基於這樣的原因，嚴健民在今年年中，不得不取消一場計劃與內地蘇州民間藝術家的合作演出計劃。

專職人才現斷層 欲組樂隊音不齊

民間中樂團體發展受限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人才斷層。與西洋管弦樂隊數百年的組合演出史不同，中樂團體的配器整合，是近幾十年的事。對中樂而言，每一種樂器，可能來自中國文化中的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例如除了傳統的二胡、笛子之外，有時具有蒙古族特色的馬頭琴也在中樂團體中。故而中樂團體要擴大，就須盡可能引入包括冷門樂器在內的各種樂器。但這對民間團體而言則太困難了。

嚴健民說，較之西樂，本港學習中樂者仍屬少數，雖然不少學校推行「一人一樂器」計劃涵蓋了中樂，但卻未有一個培養專業人才培養的銜接機制，而是流於業餘愛好。另一位香港中樂演奏家鄒宗彬則表示，中樂的專

業培養，最大挑戰是出路問題。演藝學院雖開設相關專業，但其面向全球招生，真正能夠入讀的本地生少之又少；畢業之後，提供就業的藝術團體數量則更少。而民間中樂團體自身運作困難，以專職身份選擇加入的後生，其實不會有很多，人才斷層開始浮現。

嚴健民告訴記者，專業化是不少民間中樂團體的目標，因為惟有如此，民間團體才有發展前途。而專業化的關鍵步驟，便是交響化——將中樂團體變成一個中樂交響樂隊。嚴健民統計，實現交響化需增加一倍的演奏員和各種樂器。這將是一個巨大的成本和負擔。樂器易買，人才難求，特別是招募冷門生僻樂器的演奏家，更需巨大花銷。

中型場地稀缺 政府審核措施僵化

談起不久前的「金秋的旋律」獨唱獨奏音樂會，演出已於屯門大會堂公演，全場1300個座位，卻只有100多觀眾，場地的偏遠區位是造成上座率低的原因之一。嚴健民透露，大家原本屬意葵青劇院，因為其交通方便；其次，對於類似民族藝術團這樣的中樂團體而言，葵青劇院舞台的後台很深，便於安放樂器。相形之下，原本用來推廣社區康文發展的屯門大會堂，則對居住港島、九龍以及新界東區的市民而言，其交通顯得非常不便。

然而從2013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嚴健民代表民族藝術團申請葵青劇院多達五次，均被駁回。且每次在獲得「不批准」的回覆之後，他才能組織進行第二次申請。如此導致藝術團錯過不少演出機遇。更為無奈的是，嚴健民有時從葵青劇院經過，且路過的那一日恰好是自己向政府提出申請擬定演出的日子，但整個劇院卻又往往黑燈瞎火、無人演出。他說，這有可能是原定的藝術團體因故無法演出所致，但政府卻未及時讓輪候團體遞補，可見政府對文化場地演藝申請的審核措施，非常教條和僵化。

鄒宗彬也提及，交通方便、深受行家歡迎的中環大會堂、尖沙咀文化中心、荃灣、沙田等處的劇院已經相當難以申請。民間中樂團體為了演出的進行，只能申請偏遠地區場地。紅館、伊利沙伯體育館，嚴健民則表示根本不會去申請。因為這些場地的座位人數已經過萬，完全不適合規模較小的民間中樂團體演出。對民間中樂團體而言，最需要的是交通方便的中小型藝術表演場地。嚴健民說，中小型場地的座位數應該控制在500至800，一旦超過1,000，則演出團體的營運成本將大幅提升，導致財政負擔加重；低於500，則難以發揮團體影響力。但就香港目前的現狀而言，恰恰是中型場館最為稀缺。

所以，嚴健民悲觀地認為，在缺乏政府和社會資助、表演空間稀少的情形下，擴大演奏員陣容無從談起。讓樂團走向職業化，似乎成了一種奢望。而這，也構成了香港民間中樂團體發展窘境的一個縮影。

嚴健民香港民族藝術團指揮

「演出場場虧本且難以獲得官方扶持。」



鄒宗彬 中樂演奏家

「出路問題，成為制約本港中樂後繼人才培養的最大障礙。」



■香港民族藝術團